

# 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

余壮雄 谢浪情 程嘉嘉

**内容提要:**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稳步增长,成为推动外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双循环背景下,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如何影响产品市场配置是一个重要话题。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出口贸易,借助产品空间理论深入分析了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的作用机制,将外循环和内循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能够促进国内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对于国内贸易壁垒较高或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业、产业集聚较低的地区,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该行业和扩张行业内企业的平均出口市场,且当区域内企业内部网络距离更短或外部网络距离更长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配置效应会得到强化。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回答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如何统筹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问题。

**关键词:**市场配置效率 海外市场信息交流 双循环 知识溢出 新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余壮雄,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632;

谢浪情,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510632;

程嘉嘉(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510006。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07-0147-17

##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剧烈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试图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围追堵截,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受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越南、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中国面临产业流失的风险。在此大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积极构建“以国内大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重复杂环境下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与路径研究”(22&ZD061)。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程嘉嘉电子邮箱:jiajiachengjnu@163.com。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实现产业自主与产业国际关联的平衡。显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极大地依赖于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传统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带来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行业、部门之间的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面临诸如产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和人口老龄化等阶段性问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白俊红、刘宇英,2018)。因此,如何在现有的资源约束下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和缓解资源错配已迫在眉睫,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不少学者从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低工资标准和信息不对称等角度进行展开(David等,2016;刘贯春等,2017;刘瑞翔,2019),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一国之内的影响因素,鲜有讨论双循环背景下经济外循环对提高国内市场配置效率、缓解资源错配的影响。资源错配是指存在某些因素阻碍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资源从效率高的个体反而流向效率低的个体,导致资源的边际产出在横截面上不相等,偏离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状态(Hsieh和Klenow,2009);具体就内容而言,资源配置涵盖了行业间的资源流向、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以及企业内不同产品间的资源流动(Bernard等,2012)。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日益饱和,我国企业纷纷走向海外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不同企业在海外市场交流的机会大增,这不仅改善了企业“事前”对市场信息的判断和“事后”经营决策的调整能力,优化了企业内部的要素与产品配置,而且增加了多元知识和前沿技术的溢出渠道,加速资源在不同产品间的流转,优化了行业乃至区域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可见,在双循环背景下探讨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与市场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对于激发信息对资源的有效引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2000—2015年的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从省份-产品层面分析由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带来的知识溢出对国内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出口贸易,结构性地分析出口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将外循环和内循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第二,已有文献多基于成本加成率的发散程度来度量市场配置效率,但成本数据的可得性与准确性大大降低了指标的可信度,本文在传统市场配置效率的间接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客观性的双重考虑,采用同质产品的价格相对均值偏离指数更为简单直观地度量市场配置效率,克服了核心数据不可得的问题,扩大了市场配置相关研究的场景;第三,本文率先将产品空间理论应用于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指标,为理解企业如何通过跨境信息流动来增强竞争力提供了新的量化手段,既补充了产品空间理论在微观视角的应用,同时为外循环畅通促进内循环水平提高的传导机制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为推进市场一体化、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持。

##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 (一)有关市场配置效率的研究

市场配置效率或资源错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很多学者对其指标衡量及其影响因素等展开了丰富的研究。Hsieh和Klenow(2009)开创性地提出关于市场资源错配的度量指标,并基于印度和中国的数据库,建立异质企业垄断竞争模型分析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得到后续大量研究的支持。基于这一指标,Baqee和Farhi(2020)基于1997—2015年美国

66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和企业的销售成本数据,发现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可使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约20%,资源错配同样会带来GDP增长率的降低和TFP的损失(Edmond等,2023)。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不少研究也对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拓展。如刘贯春等(2017)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分析130万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指出中国的资源错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

已有文献对市场配置效率或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亦展开了丰富的讨论。Bai等(2019)发现政府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市场干预措施严重扭曲了要素市场,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业未能及时退出市场,损害了市场配置效率;David等(2016)则认为劳动力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对外投资(白俊红、刘宇英,2018)、区域经济一体化(刘瑞翔,2019)和制度(马光荣,2014)等有助于缓解资源错配。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兴起,从知识溢出的视角探讨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表明,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与溢出不仅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而且能加速人力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匹配(刘瑞翔,2019),进而改善资源配置。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显然是重中之重。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出口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于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以试图回答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如何统筹兼顾双循环的问题。

## (二)有关出口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研究

对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研究主要可划分为三个问题。一是讨论信息交流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出口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会提高企业的出口风险,信息的搜集尤为重要(Fernandes和Tang,2014)。故而出口企业在开拓新市场时,会倾向于从相邻企业已有的出口网络中选择要进入的市场。由于先行企业的存在,后进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要素供给、生产经验、消费者偏好、出口市场等各类信息,降低出口风险和进入成本(郭琪等,2020)。二是探讨信息交流对企业出口边际的影响。当众多企业向同一目的地出口时,销售市场的集聚效应和学习效应能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从而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钱学锋等,2013)。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产品关联度越高、出口市场越邻近,信息交流带来知识外溢的可能性就越大,并通过要素禀赋优势、创新技术外溢和中间投入品规模经济等渠道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孙天阳等,2018)。三是考察信息交流对企业海外市场表现的影响。出口产品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信息和生产经验,这些知识可以借助产品网络向外传递(Hidalgo等,2007)。信息交流能够降低出口企业对于目标市场需求和出口成本的不确定性,带来产品生产经验的外溢,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刘慧、綦建红,2018)。

上述文献论证了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能够带来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可从中快速汲取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及出口销售网络 and 中间投入品供给渠道中的优质信息(孙天阳等,2018;郭琪等,2020)。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机制可知,海外市场信息交流通过引导企业出口行为从而影响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过程,主要通过“信息获取机制”“竞争强化机制”“市场扩张机制”三条渠道发挥作用。

1. 信息获取机制。与国内市场相比,出口市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信息的搜集尤为重要(Fernandes和Tang,2014)。事实上,信息作为一种先发优势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竞争策略(Yu等,2023),掌握充分的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信息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影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生产效率

(钱学锋等, 2013), 从而推动要素有序流动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当然, 这种信息获取的效果会受企业所在的内、外部网络所制约(董洁妙、余壮雄, 2021)。从外部网络看, 市场中心产品作为市场信息的聚散地, 具有强大的信息溢出功能, 当一种产品更靠近市场中心产品时, 产品内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溢出并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 有助于优化产品内的资源配置; 从内部网络看, 企业从外部获取的信息需要传递到企业各个产品以实现效果, 企业内部网络距离的缩短可加快信息的内部传递, 更快推动企业优化产品结构, 从而提升市场整体配置效率(易靖韬等, 2017)。

2. 竞争强化机制。集聚经济理论认为, 企业间的集聚能够带来知识技术溢出、劳动力蓄水池和中间投入品共享这三种空间外部性, 有助于降低行业的进入门槛(桑瑞聪、范剑勇, 2017; 孙天阳等, 2018)。当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汇集于同一个海外市场时, 会形成地理上的集聚效应, 也会带来这三种空间外部性。这不仅能够促进产品先进生产经验的信息外溢, 提高行业的生产经营效率(Lovely等, 2005), 而且企业之间也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共享更便捷的贸易信贷和市场需求信息, 降低行业的进入成本, 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 加剧行业内的竞争; 随着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 生产资源将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 降低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边际报酬差异, 有助于行业内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王红建等, 2023)。

3. 市场扩张机制。海外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 例如消费者需求、政策和销售渠道等, 是制约出口企业市场扩张的主要因素(Fernandes和Tang, 2014)。除了依靠自身有限的出口经验外, 企业更重要的是向先行企业学习, 通过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从邻近企业中获取消费者偏好、出口市场等需求侧信息, 以较低的成本来克服这些不确定性, 从而将产品出口范围拓展至未曾出口过的市场(孙天阳等, 2018)。同样地, 当企业基于获取的信息调整出口策略、扩张出口市场时, 也意味着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种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会引致市场资源配置的改进。一方面, 出口市场扩张使得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利润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一部分生产要素能够走出国门, 缓解国内市场的过度投资, 优化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和提高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白俊红、刘宇英, 2018); 另一方面, 出口市场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和无谓损失, 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此外, 出口中学习效应也有助于企业获取出口市场的特定信息和提高生产水平, 降低企业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扩展的难度(郭琪等, 2020), 出口到对产品具有更高标准的国家也有助于企业提高资源管理水平, 进而提升行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 三、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测算与特征性事实

#### (一) 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测算

关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测算, 常见的做法是使用成本加成率、全要素生产率等的标准差或方差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Hsieh和Klenow, 2009)。与之不同, Lu和Yu(2015)使用相对均值偏离指数(Relative Mean Deviation, RMD)测算中国各行业成本加成定价的发散程度, 以此来衡量中国各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地, 行业 $j$ 在 $t$ 年成本加成率的发散指数  $RMD_{jt} = n_{jt}^{-1} \sum_{i=1}^{n_{jt}} \left| (Y_{ijt} - \bar{Y}_{jt}) / \bar{Y}_{jt} \right|$ , 其中  $Y_{ijt}$  为行业 $j$ 中的企业 $i$ 在 $t$ 年的成本加成定价 ( $Y_{ijt} = P_{ijt} / MC_{ijt}$ ),  $MC_{ijt}$  为企业 $i$ 生产行业 $j$ 的边际成本,  $\bar{Y}_{jt}$  为行业 $j$ 在 $t$ 年内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加成定价。 $RMD$ 值越高, 说明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越分散, 则资源配置效率越低, 后续不少研究也沿用该指标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

然而, 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边际成本数据很难获得且估计较为烦琐, 基于成本加成率或全要素生



产率(同样需要成本数据进行计算)来测量市场配置效率的方法往往不可行或可信度比较低。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指标的客观性,对Lu和Yu(2015)的指标进行改进,采用相同质量产品的价格离散程度进行衡量。当生产相同质量产品的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和其定价逐渐趋同时,也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在逐步提升(徐舒等,2020)。也就是说,当市场配置效率较高时,资源能有效配置到单位收益最大的企业,市场上对相同质量产品的定价也会比较接近。因此,本文使用产品-省份层面的同质产品定价的扭曲程度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衡量。具体地,本文计算了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内企业的出口平均价格( $P_{ipjt}$ )和与其出口平均质量最为接近的五家企业的出口平均价格( $\bar{P}_{ipjt}$ )之间的价格发散指数,来衡量不同企业对于同质产品定价的发散程度,以此来捕捉市场配置效率。

$$RMD_{pjt} = \frac{1}{n_{pjt}} \sum_{i=1}^{n_{pjt}} \left[ \left( P_{ipjt} - \bar{P}_{ipjt} \right) / \bar{P}_{ipjt} \right]^2 \quad (1)$$

其中, $n_{pjt}$ 为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的出口企业数量。 $RMD_{pjt}$ 为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的市场配置效率,值越小说明不同企业对于同质产品定价的离散度越低,即相同质量的产品在产品-省际内的价格更接近,市场配置效率越高;反之则说明不同企业对于同质产品定价的离散度越高,市场配置效率越低。

在计算 $RMD$ 指标过程中还涉及产品质量的计算,本文沿用Khandelwal等(2013)的方法,将质量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并入需求函数中,随后将需求函数线性化,并将贸易数据中的出口价格与产品数量进行回归得到残差项,进而计算产品质量 $EQ$ ,计算过程如下:

$$\ln Q_{ijct} + \sigma \ln P_{ijct} = \alpha_{ct} + \alpha_j + \mu_{ijct} \quad (2)$$

其中, $Q_{ijc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向 $c$ 国出口产品 $j$ 的数量, $P_{ijct}$ 为企业 $i$ 在 $t$ 年向 $c$ 国出口产品 $j$ 的价格, $\alpha_{ct}$ 为出口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 $\alpha_j$ 为产品固定效应, $\mu_{ijct}$ 为误差项,本文将产品替代弹性 $\sigma$ 设为4。产品质量可由回归的残差估计得到, $EQ_{ijct} = e^{\hat{\mu}_{ijct}} / (\sigma - 1)$ ,随后将企业-产品-目的国-时间维度的质量取均值,得到企业-产品-时间维度的产品质量。

## (二)特征性事实

为了从数据上对市场配置效率给出一个直观的呈现,本文首先绘制了市场配置效率 $RMD$ 的核密度图(见图1)。①从图1来看,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的市场配置效率的分布较为集中,大都分布在0.3附近,整体来看, $RMD$ 服从峰度为15.14和偏度为3.09的右偏分布。图2进一步绘制了各年的市场配置效率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趋势图。由图2(a)可知,国内各地区同产品内的企业对于同质产品的定价是逐渐趋同的,这就意味着国内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正在逐步提高, $RMD$ 从2001年的0.53下降至2015年的0.39,国内整体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提高了26.42%。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积极投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扩大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企业间在海外市场的交流与合作也趋于加强,见图2(b)。

为了考察上述市场配置效率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同步上升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本文对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指标进行分组,②绘制了不同分组下市场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图。图3(a)和(b)分别对应产品内企业(平均而言)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较强和信息交流较弱的样本。不难看出,具有较

① 样本与数据处理详见第四部分。

② 以各年各省份各产品内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海外市场信息交流高(高 $ICO$ )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低(低 $ICO$ )两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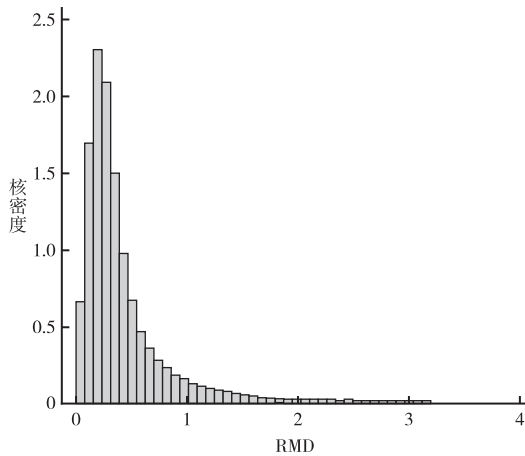


图1 RMD的核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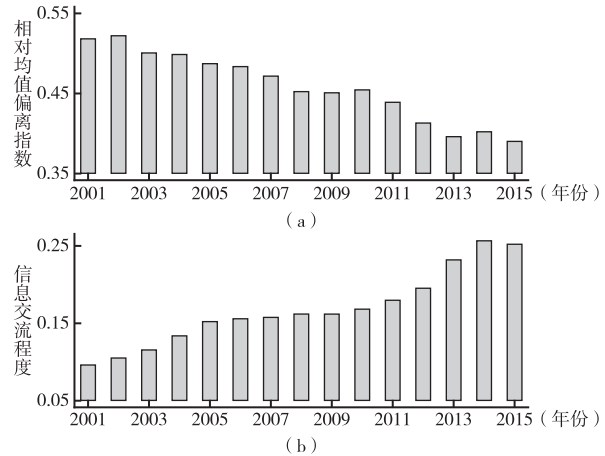


图2 市场配置效率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变动趋势

高强度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出口企业对于同质产品的定价的趋同程度更高。从数值上看,海外市场信息交流较高的样本组的 $RMD$ 从2001年的0.44下降至2015年的0.32,市场配置效率提高了27.27%,高于信息交流较低的样本组的效率升幅。上述结果反映了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提升市场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后文将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考察信息交流对于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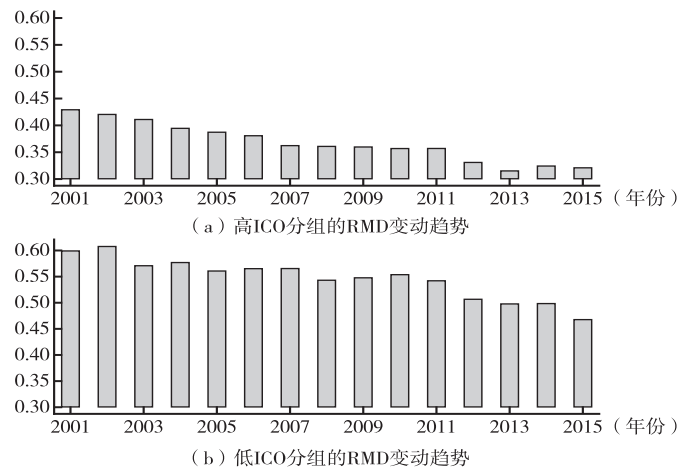


图3 高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下市场配置效率变动趋势

#### 四、数据处理与计量模型构建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与被解释变量市场配置效率的测算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由于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交流,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只保留制造业和一般贸易非中间商企业,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将原始数据压缩至

企业-年份-产品-出口目的国维度;从海关数据库企业编码中提取前两位来识别省份信息,从产品HS8位码中提取前4位作为产品分类编码,并统一调整为1996年版本;将数据汇总至省份-产品-年份维度,并剔除了同一省份同一产品中经营企业数量少于5家的样本。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了各省份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利用外资比例,从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中获取了产品出口关税数据,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获取了出口目的国人均GDP、出口汇率等数据。

## (二) 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RMD_{pjt} = \alpha_0 + \alpha_1 ICO_{pjt,t-1} + x'_{pjt,t-1} \alpha_2 + \gamma_{pj} + \gamma_t + \varepsilon_{pjt} \quad (3)$$

其中,下标 $p$ 、 $j$ 、 $t$ 分别对应省份、产品和年份;因变量 $RMD_{pjt}$ 为 $t$ 年 $p$ 地区 $j$ 产品的市场配置效率,核心解释变量 $ICO_{pjt,t-1}$ 为 $t-1$ 年 $p$ 地区 $j$ 产品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 $x'_{pjt,t-1}$ 为影响市场配置效率的控制变量。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处理,并控制了省份-产品交叉固定效应 $\gamma_{pj}$ 和年份固定效应 $\gamma_t$ , $\varepsilon_{pjt}$ 表示误差项。此外,为了排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在1%的水平下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 (三) 变量设定

### 1. 核心解释变量

产品空间理论的提出为信息交流的衡量提供了可行方法。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产品本身是其生产主体(国家、地区、企业……)生产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反映,不同产品间会因生产要素组合(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关联而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Hidalgo等,2007),这种相似性决定了知识迁移的便利性,相似性越高的产品间知识越容易实现迁移,相似性越低的产品越可能在迁移中遭受生产力的损失(郭琪等,2020)。因而,本文沿用产品空间理论的相关研究,基于两个产品被同一地区同时出口的可能性越大,两个产品之间的关联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信息交流的基本逻辑,构建产品间信息交流的指标。考虑到现实中出口网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文在基于产品相似性逻辑构建信息交流指标的基础上,将出口目的国相关的地理信息引入产品相似度的计算当中,以更好地反映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具体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ICO_{pjt} = \frac{1}{N} \sum_{p'} \sum_c \min \left\{ \frac{n_{pjct}}{\sum_c n_{pjct}}, \frac{n_{p'jct}}{\sum_c n_{p'jct}} \right\} \quad (4)$$

其中, $n_{pjct}$ 为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出口到目的国 $c$ 的企业数量, $n_{pjct} / \sum_c n_{pjct}$ 表示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出口到目的国 $c$ 的条件概率, $N$ 为在 $t$ 年出口产品 $j$ 的地区数量。由于同产品两地区所计算的条件概率不相等,故取二者中的小值来衡量两地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程度。直观上看,该指标使用不同地区间相同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分布交集来衡量两个地区的企业关于同一产品的信息交流程度,其几何意义对应两种产品的出口地理分布密度的交集,若两个地区出口同一产品的企业同一目的地市场同时出现的条件概率较大,则这两个地区内同产品的出口企业对该产品生产、销售和创新所需的条件也会更加类似,地区间知识迁移的难度越低,对于生产信息和销售信息的交流就可能越多。

### 2. 控制变量

参照既有研究,本文从地区特征和产品特征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包括各省份人均GDP的对数( $\ln gdp_{per}$ )、人口密度的对数( $\ln pop\_d$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比重( $r\_fdi$ )等省份-年份层面控制变量;

出口平均地理距离的对数( $\ln WDist$ )、出口平均汇率的对数( $\ln WRER$ )以及出口平均关税的对数( $\ln WTariff$ )等产品-年份层面控制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对数( $\ln expy$ )和市场集中度( $HHI$ )等省份-产品-年份层面的控制变量。<sup>①</sup>

## 五、实证分析

###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来实证检验出口企业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首先从列(1)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出口相同产品的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会显著降低不同企业对于同质产品定价的发散程度,质量相近的产品的定价会逐渐实现趋同,整体表现为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由列(2)~(4)可知,在依次加入产品-年份层面控制变量、省份-年份层面控制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存在。以列(4)为例, $ICO$ 的系数为-0.2539,意味着当年产品间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每提升1个标准差单位,下一年的国内市场资源错配程度就会下降0.0277个单位,约为 $RMD$ 的5.7%个标准差单位,<sup>②</sup>说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L.ICO$	-0.5479*** (0.0376)	-0.5460*** (0.0378)	-0.4934*** (0.0363)	-0.2539*** (0.0347)
$L.\ln WDist$		0.0114 (0.0170)	0.0124 (0.0172)	0.0289* (0.0161)
$L.\ln WTariff$		-0.0219*** (0.0066)	-0.0216*** (0.0066)	-0.0195*** (0.0062)
$L.\ln WRER$		-0.0012 (0.0013)	-0.0012 (0.0013)	-0.0016 (0.0013)
$L.\ln pop\_d$			-0.2311*** (0.0538)	-0.2389*** (0.0530)
$L.r\_fdi$			-0.0870*** (0.0128)	-0.0838*** (0.0127)
$L.\ln gdpper$			-0.3857*** (0.0318)	-0.3628*** (0.0310)
$L.HHI$				0.1776*** (0.0092)
$L.\ln expy$				-0.0292*** (0.0018)

① 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选取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留存备案。

② 样本期间 $ICO$ 的标准差为0.109, $RMD$ 的标准差为0.486。另外,此处实证结果表明,产品间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每提升1个标准差单位,国内市场的资源错配程度可以下降0.057个标准差单位,约为15年来市场资源错配效率下降的1/5(根据图2的测算结果,2001—2015年中国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错配程度指标整体从0.52下降到0.38,下降约0.3个标准差),说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



续表 1

变量	(1)	(2)	(3)	(4)
省份-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sup>2</sup>	0.4535	0.4538	0.4566	0.4638
N	148347	148347	148347	148347

注:括号中的值是聚类到产品维度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如无特殊说明,所有回归均控制了省份-产品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下同。

(二)稳健性和内生性讨论<sup>①</sup>

1.不同样本处理

(1)删除直辖市样本。由于直辖市身份特殊,拥有众多国有企业,信息交流方式可能存在差异,而且直辖市GDP较高且地理面积小,便于政府直接进行干预,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

(2)剔除部分年份数据。由于海关数据库2015年之后的数据对出口企业中间商的界定信息不完整,和2000—2013年的数据存在差异,故本文剔除2014—2015年的数据以排除特殊年份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回归结果表明,排除特殊样本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2.内生性讨论

(1)遗漏变量问题。为了解决回归方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在回归中增加省份-产品、省份-年份、产品-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各省份经济禀赋、产品特征和年度政策变化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2)反向因果问题。考虑到资源错配程度过高可能会阻碍企业国内生产经营,促使企业转向海外市场业务,增加其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使得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的思路来克服可能的估计偏误。具体地,本文使用与本省地理距离最近的相邻省份的海外市场交流指标(剔除该省与本省海外市场信息交流部分)作为本省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指标的工具变量,指标构建方式如下:

$$IV\_ICO_{pjt} = \frac{1}{N-1} \sum_{p \neq p'} \sum_c \min \left\{ \frac{n_{\tilde{p}jct}}{\sum_c n_{\tilde{p}jct}}, \frac{n_{p'jct}}{\sum_c n_{p'jct}} \right\} \quad (5)$$

其中, $\tilde{p}$ 为距离 $p$ 省份省会城市地理距离最近的城市。一方面,因地理临近所带来的地区间生产禀赋的相似使得任意两个相邻省份 $p$ 和 $\tilde{p}$ 与其他地区的(平均)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因为在指标构建时剔除了省份 $p$ 和 $\tilde{p}$ 之间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省份 $p$ 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很难会影响省份 $\tilde{p}$ 与其他地区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情况。故而,上述构建的工具变量能够很好地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定。使用上述方法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工具变量均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回归结果也支持了本文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3.因变量指标构建

(1)放松出口产品质量相近的企业数量限制。前文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指标的构建考虑到不同企业生产同种产品可能会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异,因而选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相近的五家企业作

<sup>①</sup> 受篇幅所限,稳健性与内生性结果未展示,留存备案。

为参照进行计算,以捕捉同质量产品的特征。为检验本文的指标构建并不依赖于特定样本的选择,此处选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相近的十家企业作为参照构建  $RMD1$  指标。

(2) 替换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指标。直接采用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中各企业的价格质量比相对所有企业均值的偏离程度来衡量,计算方式如下:

$$RMD2_{pjt} = \frac{1}{n_{pjt}} \sum_{i=1}^{n_{pjt}} \left| (Y_{ipjt} - \bar{Y}_{pjt}) / \bar{Y}_{pjt} \right| \quad (6)$$

其中,  $Y_{ipjt}$  表示地区  $p$  产品  $j$  中的企业  $i$  在  $t$  年份的价格质量比 ( $Y_{ipjt} = P_{ipjt} / EQ_{ipjt}$ ),  $EQ_{ipjt}$  为地区  $p$  企业  $i$  生产  $j$  产品的质量,其计算方式与基准回归中的算法相同,  $\bar{Y}_{pjt}$  为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份内所有企业价格质量比的平均值,  $n_{pjt}$  为地区  $p$  产品  $j$  在  $t$  年份的出口企业数量。

(3) 更改产品质量的计算方法。前文计算产品质量是主要参考 Khandelwal 等 (2013) 的方法,通过控制出口目的国-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固定效应,利用价格和需求数量信息进行估算。考虑到文献中对质量测算的不同处理,如 Feng 等 (2017) 在 Khandelwal 等 (2013) 的基础上将效用函数设为 CES 的形式,通过控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提出另一种产品质量的估算方法。本部分参考 Feng 等 (2017) 的做法,重新估算产品质量,并将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企业-产品-时间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价格,接着用基准回归的构建方法可计算得到产品市场配置效率  $RMD3_{pjt}$ 。回归结果均较为稳健。

#### 4. 调整产品维度

针对不同产品维度下指标构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本文分别采用制造业 2 位代码维度 (GB/T 4754—2002) 和 HS6 位产品分类构建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和产品市场配置效率变量。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在较为宽泛的 GB/T 4754—2002 分位分类下,还是较为细致的 HS6 位产品分类下,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均较为稳健。

#### 5.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本部分进一步对国有企业改革、外资管制放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税制改革等政策因素进行控制。首先,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相对漫长,分多个阶段逐步深入推进,市场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行业的资源配置情况。借鉴董雪兵等的 (2021) 做法,在式 (3) 的基础上加入  $p$  省  $j$  产品国有企业数量占比。<sup>①</sup> 其次,2002 年我国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修订,外资管制放松加剧本国市场竞争、扩大行业市场规模、提高销售不确定性,进而影响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流向,本文同样在式 (3) 的基础上加入  $p$  省  $j$  产品外资企业数量占比。再次,中国加入 WTO 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同样会对国内市场竞争、企业出口等造成长期且直接的影响,借鉴董雪兵等 (2021) 的做法,本文加入各省份历年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最后,政府推行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市场干预措施是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政府财税政策可能会改变税价关系而影响价格信号的有效传递,从而提高地区间各类要素的错配程度 (余壮雄等, 2021), 而 2002 年企业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企业实际承担的有效税率水平的下降可能会进一步改善企业资源错配状况,本文加入各省份企业所得税的对数值。可以发现,在分别控制了这些同期政策干扰因素后,  $ICO$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sup>①</sup> 本文根据中国海关出口数据中的企业第六位编码识别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具体地,若企业第六位编码为 1, 则认为其为国有企业;若企业第六位编码为 2、3 或 4, 则认为是外资企业。

(三)异质性分析

1.政策支持异质性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抓手,在推动中国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企业投资行为扭曲、要素市场扭曲等相关问题,低效率的企业容易凭借与政府的特殊关联而存活(Bai等,2019)。因而,是否获得产业政策支持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策略和行业内的资源流向,而且可能会影响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国内产品市场配置的效果。据此,本文参考Yu等(2020)的研究,构建产品受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强度指标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地,本文根据中央及各省份“九五”至“十二五”五年规划的官方文件提取重点发展行业和发展关键词来确定,构建了受中央或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强度指标 $KI_c$ 和受地方重点产业政策支持强度指标 $KI_p$ ,并分别以上述指标各年的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2。可以看到, $ICO$ 的系数在各组回归中均显著为负,但政策支持组别的系数的绝对值更大,且两组系数的差异显著,说明相较于未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更能显著改善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这一结论符合已有研究的发现,因为尽管产业政策是推动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但也容易使得部分资源从高生产率企业流向低生产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有序流动,扰乱了要素市场的正常定价机制(Yu等,2020),使得国内市场的信息交流没有发挥应有的资源引导作用,此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作为国内市场信息交流的重要补充,为出口企业获取外部信息提供了新的渠道,进而推动出口市场重新配置(余壮雄等,2021)。

表 2 异质性分析:政策支持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央地支持	非央地支持	中央支持	非中央支持	地方支持	非地方支持
$LICO$	-0.3028*** (0.0627)	-0.2064*** (0.0363)	-0.3641*** (0.0485)	-0.1407*** (0.0387)	-0.3383*** (0.0516)	-0.1995*** (0.03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5224	0.4980	0.5052	0.4874	0.4970	0.4993
$N$	49560	96832	68134	78268	64506	81217
经验 p 值	0.021**		0.000***		0.000***	

2.地区异质性

已有研究较早发现企业在地理空间中的集聚对企业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推动作用(Lovely等,2005),但企业能否利用集聚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则与自身储备的相关能力有关(郭琪等,2020)。由于中国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地理区位、经济条件等的差异,企业不同区域间的集聚程度及对信息利用程度也有所不同,由此对海外市场信息利用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进行分组回归,以此考察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在地区间的异质性。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ICO$ 的系数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样本中均显著为负,而在东部地区样本中并不显著。这可能与信息交流渠道的可替代性有关,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更为发达,不仅具备更为完善和开放的营商环境,资本、劳动力等各类要素的流通更畅通,企业更容易通过要素共享获取产品和市场信息(白俊红、刘宇英,2018),而且企业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也相对更多,企业间交流的信息也更为丰富(孙天阳等,2018)。此外,东部地区的国内市场也具

有更为完善的信息交流,大量的企业在空间和产业上的集聚亦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取到出口信息。可见,东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国内市场信息交流,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渠道存在相互替代,故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相对而言,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竞争机制并不完善,且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信息交流渠道相对匮乏,从国内市场获取的经验较为有限,因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

### 3. 国内贸易成本异质性

贸易成本是阻碍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国内要素市场的扭曲不仅降低了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制约了生产、贸易活动开展(Eaton和Kortum,2002),削弱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的作用。参照韩佳容(2021)的做法,本文运用Head-Ries指数来测算中国不同区域间不同行业的国内贸易成本,<sup>①</sup>并以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国内贸易成本低的行业 and 国内贸易成本高的行业,分组回归结果见表3的最后两列。可以发现,核心变量 $ICO$ 的系数在两组中均显著为负,支持了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的普遍性。 $ICO$ 的系数的绝对值在国内贸易成本高的行业中更大,且两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更高国内贸易成本的产品,不仅需要支付包含地理距离等物理因素引起的运输费用等客观性贸易成本,还会面临因各地贸易保护、消费差异引发的交易成本,这些隐性的国内贸易成本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生产资源流动,影响了企业间国内市场信息交流的作用(韩佳容,2021),此时与之具有替代效应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该行业的资源配置改善作用更为突出。而行业间较低的贸易成本往往也意味着要素等流通更为顺畅,更高效的信息传递使得资源能够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企业(毛其淋、盛斌,2012)。因而,在贸易成本更低的行业中,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该行业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提升作用弱于国内贸易成本高的行业。

表3 异质性分析:地区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5)	(6)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低国内贸易成本	高国内贸易成本
$LICO$	0.0041 (0.0364)	-0.3992*** (0.0915)	-0.3402*** (0.0635)	-0.2629*** (0.0674)	-0.2016*** (0.0383)	-0.3110*** (0.047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4680	0.4619	0.4363	0.4704	0.4879	0.4519
$N$	84262	23028	14283	23832	78511	68995
经验p值					0.005**	

## 六、机制检验

### (一) 信息获取机制

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来源丰富、结构多元的信息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尤其对于面临更高贸易不确定性的出口产品来说,汲取充分有效的信息不仅有助于降低出口风险,更有助于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已有研究表明,位于市场中心位置的产品往往连通性更强,与其他产品

<sup>①</sup> 受篇幅所限,具体的指标构建方法未展示,留存备案。



之间存在更多的信息交流,多元知识和前沿技术的储备更为丰富,因而与其距离相近的产品能更快地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要素供给渠道等信息;相应地,位于企业自身核心位置的产品同样也是企业内部最具有比较优势和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缩短企业产品组合与自身核心产品的距离,有助于加快知识和信息的传递(董洁妙、余壮雄,2021)。不同的是,当企业生产的产品更靠近市场中心产品时,更丰富多元的信息可能与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中汲取的信息重合,从而与之存在相互替代;而当企业生产的产品越集中,往往也意味着企业通过自身生产的产品去获取外部信息或更多元的信息的难度更大,此时,这些企业会更依赖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来获取有用的信息,故而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作用会更加有效。据此,本文借鉴董洁妙和余壮雄(2021)的处理,构建企业产品结构距离市场中心产品(外部网络距离)和距离自身核心产品(内部网络距离)的距离指标,<sup>①</sup>回归结果分别见表4的列(1)和(2)、列(3)和(4)。可以发现,外部网络距离( $Dist\_to\_MC$ )与 $ICO$ 交互项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当产品比较接近市场中心产品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国内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效应会减弱;而内部网络距离( $Dist\_to\_IC$ )与 $ICO$ 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当产品内企业的产品结构越集中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国内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会被强化。这不仅说明信息获取是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提高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重要调节因素,同时也佐证了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是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

表4 机制分析:信息获取机制

变量	(1)	(2)	(3)	(4)
$L.ICO$	-0.1277 (0.1692)	0.2522 (0.1691)	-1.6435*** (0.1380)	-0.9918*** (0.1256)
$L.ICO \times L.Dist\_to\_MC$	-0.4120** (0.1856)	-0.5436*** (0.1836)		
$L.Dist\_to\_MC$	0.5770*** (0.0693)	0.4300*** (0.0671)		
$L.ICO \times L.Dist\_to\_IC$			9.3183*** (0.9561)	6.1049*** (0.8753)
$L.Dist\_to\_IC$			-3.7388*** (0.3192)	-2.3018*** (0.3076)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R^2$	0.4551	0.4643	0.4561	0.4647
$N$	148347	148347	148347	148347

## (二)竞争强化机制

近邻信息溢出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表现,降低行业的进入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参与行业竞争(Fernandes和Tang,2014)。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行业内的竞争程度激烈,会迫使企业提升其生产资源管理水平,降低企业间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差异,有助于加速生产资源在产品内的流动,提高产品市场配置效率。对此,本文分别计算了 $t$ 年 $p$ 省产品 $j$ 的出口企业数量的对数 $\ln Num\_EX$ 和新增出口企业数量的对数 $\ln New\_EX$ 来反映产品内的竞争程度,将式(3)中因变量分别替换成这两个指标进行探讨,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的列(1)和列(2)。结果显示,海外市场信

<sup>①</sup> 市场中心产品定义为与其他产品平均相似性最高的产品;企业核心产品定义为企业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受篇幅所限,具体的指标构建方法未展示,留存备案。

息交流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会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并参与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了产品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市场竞争的加剧激发了企业的“逃离竞争”效应,即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或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使得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实现了资源在企业间的优化(王红建等,2023)。因此,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提升了产品的竞争程度是其改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原因。

(三)市场扩张机制

当产品内有多家企业汇集于同一出口市场时,其所掌握的出口渠道、消费者偏好等需求信息会发生外溢,降低产品内不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Poncet和De Waldemar,2015)。由此可见,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带来的出口销售渠道信息可降低企业搭建产品销售网络的成本,推动企业出口边际的扩张(孙天阳等,2018),销售信息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有助于企业进入门槛更高的新市场。当企业能够向更多国家出口时,可使其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出口的扩张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和市场的无谓损失。同时,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伴随着需求学习效应,能够帮助企业获取产品设计等特定需求信息,降低企业生产的固定成本,促使企业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使其能达到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门槛(桑瑞聪、范剑勇,2017),而且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已达到质量门槛但因缺乏进入信息而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市场的企业的出口,降低企业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扩展的难度(郭琪等,2020),而更高标准的出口市场会间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管理水平,进而提高整个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此,本文分别计算了 $t$ 年 $p$ 省产品 $j$ 中各企业的出口国家数量的对数 $\ln CNum\_EX$ 和出口高收入国家数量的对数 $\ln H CNum\_EX$ ,并将其取均值压缩至省份-产品-年份维度,以此来反映产品内企业搭建出口销售网络的禀赋能力,并将式(3)中因变量分别替换成这两个指标进行探讨,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的列(3)和列(4)。结果显示,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于出口国家数量和出口高收入国家数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海外市场信息交流有助于扩张企业的出口市场,出口到更多的国家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出口到更多高收入国家所带来的质量提升效应都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促进出口市场扩张是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原因。

表5 机制分析:竞争强化机制和市场扩张机制

变量	(1)	(2)	(3)	(4)
	L.lnNum_EX	L.lnNew_EX	L.lnCNum_EX	L.lnH CNum_EX
L.ICO	1.9813*** (0.0802)	0.7386*** (0.0606)	0.8945*** (0.0509)	1.1107*** (0.04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 <sup>2</sup>	0.9065	0.7426	0.8653	0.8530
N	148347	148347	148347	148347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围绕资源错配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有价值的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测算了2001—2015年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和产品内企业的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程度,并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切入点,

探讨出口贸易中的知识外溢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深入阐释了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微观作用机制。本文不仅进一步充实了缓解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而且将外循环与内循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刻理解对外开放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信息交流能够显著提高产品市场的配置效率,缓解产品市场的资源错配现象。在更改核心指标的测算方式、考虑不同的产品分类标准和删除特殊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本文结果均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本文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更大的行业而言,海外产品市场信息交流对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且中央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的提升作用也更大。海外市场信息交流能显著改善我国产业集聚程度低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错配,能显著提高国内贸易成本更高的行业的产品市场配置效率。通过机制分析可以发现,出口贸易带来的产品销售网络信息,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范围,提高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海外市场的碰撞交流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行业的竞争中来,有利于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当区域内企业普遍具有较短的内部网络距离和较长的外部网络距离时,信息获取的受限会迫使企业更依赖海外市场信息交流,从而强化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对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引申出以下政策含义。第一,缓解市场资源错配、提高国内产品市场配置效率,除了从制度和经济建设等方面进行变革完善,还应该积极转变发展思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外市场,降低企业间的交流壁垒和无序竞争,促使更多知识在企业的信息网络中传递。第二,外循环的畅通不仅不会牺牲国内市场整合的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品市场配置效率的提升。政府应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降低各地对产业和企业的过度保护,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致力于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第三,企业海外市场信息交流可以弥补产业政策对市场的扭曲作用,缓解国内市场分割对市场效率的破坏。政府应发挥信息管理的优势,搭建企业交流平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获取条件,鼓励企业之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以降低企业的投入成本、提升产品市场配置效率,形成一个高效的统一大市场。

#### 参考文献:

1. 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期。
2. 董洁妙、余壮雄:《产品配置如何让出口企业变得更清洁》,《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
3. 董雪兵、董文博、池若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吗?》,《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
4. 郭琪、周沂、贺灿飞:《出口集聚、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企业出口扩展》,《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
5. 韩佳容:《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6. 刘贯春、陈登科、丰超:《最低工资标准的资源错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7期。
7. 刘慧、綦建红:《“邻居”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有多大——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财贸经济》2018年第8期。
8. 刘瑞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长三角26个城市的证据》,《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9. 马光荣:《制度、企业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市场化转型的研究》,《财贸经济》2014年第8期。
10. 毛其淋、盛斌:《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
11. 钱学锋、王胜、陈勇兵:《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事实与解释》,《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
12. 桑瑞聪、范剑勇:《出口学习效应再验证——基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4期。
13. 孙天阳、许和连、王海成:《产品关联、市场邻近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5期。
14. 王红建、王靖茹、吴鼎纹:《并购活跃度、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错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23年第12期。

15. 徐舒、杜鹏程、吴明琴:《最低工资与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断点回归设计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1期。
16. 易靖韬、傅佳莎、蒙双:《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转换与资源配置》,《财贸经济》2017年第10期。
17. 余壮雄、丁文静、董洁妙:《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统计研究》2021年第1期。
18. Bai, Y., Jin, K., & Lu, D., Misallocation under Trade Liber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26188, 2019.
19. Baqaee, D. R., & Farhi, E., Productivity and Misallocation i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5, No.1, 2020, pp.105–163.
20. Bernard, A. B., Jensen, J. B., Redding, S. J., & Schott, P. K., The Empirics of Firm Heterogene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4, No.7, 2012, pp.283–313.
21. David, J. M., Hopenhayn, H. A., & Venkateswaran, V., Information, Mis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1, No.2, 2016, pp.943–1005.
22. Eaton, J., &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Vol.70, No.5, 2002, pp.1741–1779.
23. Edmond, C., Midrigan, V., & Xu, D. Y., How Costly Are Markups?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31, No.7, 2023, pp.1619–1675.
24. Feng, L., Li, Z., & Swenson, D. 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06, 2017, pp.20–36.
25. Fernandes, A. P., & Tang, H., Learning to Export from Neighb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4, No.1, 2014, pp.67–84.
26. Hidalgo, C. A., Klinger, B., Barabási, A. L., & Hausmann, R.,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No. 5837, 2007, pp.482–487.
27. Hsieh, C. T., &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4, No.4, 2009, pp.1403–1448.
28.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 Wei, 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3, No.6, 2013, pp.2169–2195.
29. Lovely, M. E., Rosenthal, S. S., & Sharma, S., Inform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Headquarters of US Exporter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5, No.2, 2005, pp.167–191.
30. Lu, Y., & Yu, 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 Dispers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7, No.4, 2015, pp.221–253.
31. Poncet, S., & De Waldemar, F. S., Product Relatedness and Firm Exports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29, No.3, 2015, pp.579–605.
32. Yu, Z., Cheng, J., Shi, X., & Yang, Y., How Does the Go-with-the-Flow Export Strategy Affec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Vol.32, No.6, 2023, pp. 3596–3611.
33. Yu, Z., Dong, J., & Feng, Y., The Impacts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ial Plans on China's Exports and Trade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9, No.121, 2020, pp.141–158.

## Overseas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he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Products

YU Zhuangxiong, XIE Langqing (Jinan University, 510632)

CHENG Jiaji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510006)

**Summary:** At this stage,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of development, facing such problems as industry restructuring, overcapacity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among others. The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l is not sustainable.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lleviate resource mismatch under the exist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has become a question we must



answer in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for how to improve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factors, but rarely discusses the role of external economic flows in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domestic marke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porters have steadily grown in numbers in the country, which not only optimizes their internal factor and product mix, but also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atabase of China Customs from 2000 to 2015,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overseas market information exchange can affect product market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product space theory, and integrat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low and the domestic economic flow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help us take into account the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as we work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aper's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exporters' overseas market information exchange affects the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products, and integrat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low and the domestic economic flow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Second,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measures the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divergence of markup, but the availability and accuracy of cost data greatly reduce the credibility of indicators. This paper takes it into consideration and provides a simpler method to measure the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by using the price relative mean deviation index of homogeneous products. Third,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quantitative means for understanding how enterprises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cross-border information flow, and complem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roduct space at the micro level.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via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low promotes the domestic economic flow.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can be derived from this paper. Firs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ddition to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s and boo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also actively change the development mindset, promot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reduce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nd disorderly competi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more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of enterprises. Second, the smooth economic flow overseas will not only satisfy the needs of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ssue policies to reduce the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Third, enterprises' overseas information exchange can make up for the distor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on the market and alleviate the damage of domestic market segmentation to market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uild a platform for 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provide enterprises mor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encourage the exchange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mong enterprises, so as to reduce their input cos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allocation, and form an efficient unified market.

**Keywords:** Market Allocation Efficiency, Overseas Information Exchange,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Knowledge Spillover,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JEL:** Q56, L13, O25

责任编辑:原 宏